

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

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界记往/戴逸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11  
(戴逸文集)  
ISBN 978-7-300-26399-1

I. ①学… II. ①戴…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8337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戴逸文集

学界记往

Xuejie Jiw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195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mm×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21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9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目 录

纪念郑天挺老师 .....	1
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	8
悼念尚钺同志 .....	15
睿智的学者 勇猛的斗士	
——忆黎澍同志 .....	21
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 .....	29
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光明大道	
——在纪念吴晗同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 .....	33
哲人其萎 风范长存 .....	39
纪念陈垣教授 .....	45
纪念范文澜同志 .....	51
融学术、哲理、诗思于一身	
——纪念翦伯赞同志 .....	54
邓拓与历史科学 .....	57
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 .....	70
纪念罗荣渠同志 .....	74
回忆金应熙同志 .....	76
纪念马奇同志 .....	78
怀念陆荫乔（戈平）学友 .....	82
回忆北京大学子民图书室的草创 .....	87
罗髻渔同志的风雨征程 .....	94
忆交大学风 .....	117
初进北大 .....	119

我选择了历史专业 .....	123
我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 .....	128
我走上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	132
我的学术生涯 .....	138
借来斋记 .....	150
我和清史 .....	153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	155
金田起义出大湟 .....	161
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几位新兵 .....	166
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情 ——纪念周口店中国猿人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 .....	169
总结经验 攀登高峰 .....	172
五四运动与中国青年 .....	178
纪念鸦片战争 弘扬爱国精神 .....	180
纪念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	187
纪念太平天国 研究中国农民 .....	190
纪念郑成功 .....	192
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纪实 .....	196
继承、发扬孙中山的精神遗产 .....	200
世界一体化潮流中的桃源乐土 .....	207
尊老崇文 抒写新篇 ——在纪念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建馆 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212
三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	220
在第三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 .....	223
在“王朝宫廷比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225
清史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感言 .....	228
致季老（羨林）[2001 年 3 月 27 日] .....	229
致茅海建 [2002 年 3 月] .....	230
致郭成康、陈其泰 [2003 年] .....	232
致祁龙威 [2004 年 2 月 4 日] .....	233

答传记组同志问 [2004年2月16日] .....	235
写给魏玮小朋友的一封信 [2004年2月23日] .....	237
致杨国强 [2004年5月10日] .....	239
致陈祖武 [2004年5月23日] .....	240
致张海军 [2004年6月7日] .....	241
致柯愈春 [2004年7月29日] .....	243
致任老(继愈) [2004年8月27日] .....	245
致潘振平 [2005年1月14日] .....	247
致李文海 [2005年1月18日] .....	249
致吴建雍 [2005年2月16日] .....	251
致徐和雍 [2005年2月27日] .....	253
致祁龙威 [2005年3月10日] .....	254
致潘振平 [2005年3月25日] .....	255
致卞孝萱 [2005年5月20日] .....	257
致蒋寅 [2005年5月27日] .....	258
致程献 [2005年8月1日] .....	259
致严云绶 [2005年8月10日] .....	264
致朱诚如 [2005年8月19日] .....	265
致郭成康、赫治清 [2005年9月5日] .....	267
致吴建雍 [2005年9月17日] .....	268
致郭成康 [2005年11月2日] .....	270
致郭成康等典志组专家 [2006年2月12日] .....	271
致马楚坚 [2006年2月13日] .....	277
致章开沅 [2006年2月] .....	278
致程献 [2006年9月19日] .....	279
致马自毅 [2006年9月24日] .....	282
致朱育礼 [2006年9月26日] .....	284
致汪敬虞 [2006年10月31日] .....	285
致郭成康 [2007年6月27日] .....	286
致孙燕京、宝音 [2007年7月11日] .....	287

致赫晓琳、赵晨岭 [2007年10月16日]	288
致缪廷杰 [2007年11月29日]	289
致程必定 [2007年12月]	290
致罗老(哲文) [2007年12月]	291
致汤志钧 [2008年1月14日]	292
致杨遵道 [2008年8月]	293
致马大正 [2008年9月17日]	294
致典志组 [2008年10月]	296
致典志组各位专家 [2009年4月9日]	297
致郭成康等专家 [2009年5月5日]	303
致潘振平等专家 [2009年10月28日]	305
致周远廉 [2010年6月12日]	307
致郭成康 [2011年4月2日]	308
致郭成康 [2011年4月4日]	310
致沈秋农 [2011年10月23日]	311
致编审组 [2011年11月6日]	312
致周琦珍 [2011年12月26日]	314
致编委会各主体组 [2011年12月31日]	315
致潘振平 [2012年3月29日]	316
致郭成康、宋元强、陈铮 [2012年4月9日]	317
致郭成康 [2012年11月3日]	319
致郭成康 [2013年5月11日]	321
致谢俊美 [2013年6月1日]	322
致主任办公会议、项目中心、各业务组 [2013年7月9日]	323
致潘振平 [2013年8月14日]	325
致陆文灏 [2014年3月6日]	327
致编委会主任会议 [2015年3月12日]	328
致编委会主任会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感言 [2016年7月24日]	329
致成崇德、郭成康、刘仲华 [2018年1月22日]	331

## 纪念郑天挺老师\*

郑天挺教授是我的老师。我听他讲课、和他过从较多是在1946年至1948年。那时，我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郑老师则是史学系的主任，兼学校的秘书长。北大的校长胡适是社会名流，从事政治活动，暇时研究《水经注》，管不了学校的许多具体事务。北大不设副校长，而设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由“三长”分工代行校长的职权，其中秘书长尤其重要，对外代表学校，事务繁多，差不多相当于副校长，实际管理着这座名闻遐迩的最高学府。所以，郑天挺先生是十分忙碌的，每天来校上班，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在上课铃打响之前，一辆三轮车从沙滩北大的西门进来，郑老师端坐在车上，带着公事包，天冷时盖着一条呢毯，直奔子民堂（秘书长的办公室在子民堂西侧厢房，与校长办公室相对）。他整天忙着和各方面打交道，或埋头处理学校的公务。当暮色苍茫，同学们准备吃晚饭时，他才乘车离去，回到西城毛家湾住宅。北大的同学经常见到辛苦忙碌的郑先生风雨无间，早来晚归。这一情景至今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那时，郑天挺老师将近50岁，身体健康，精力过人。工作那样繁忙，待人接物却总是和蔼可亲、从容不迫，工作有条不紊、深入细致、效率很高。北京大学是包括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医、农）的大学校，机构繁多，人员复杂。全国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学校碰到许多困难，物价飞涨，经费拮据，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开展。郑先生要照管全校几千人的学习、吃饭、人身安全，肩上的担子是

---

\* 原载《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以下没有题注或题注中未标原载的，均为首次刊载。



很重的。可他还兼史学系主任，给学生开课，处理系里的工作。现在说这些，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偌大的北京大学史学系并没有一个专职干部，系里的具体事务是郑天挺老师亲自处理的，只有一位助教协助他工作。郑老师对具体事务极其认真。记得我刚入学校，开学选课时，郑老师主动找我们几个同学谈话，指导我们在选课时应注意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接触。他对青年学生诚恳、亲切，以平等态度待人，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业和生活。

郑天挺老师坚持不脱离教学，给我们开设“明清史”，认真讲课，从不缺课或迟到。他讲课是没有讲稿的，只带一叠卡片，讲起来却成竹在胸，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他知识渊博，观察力敏锐，讲话既清晰扼要，又条理井然，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他的课是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同学们都喜欢听这门课，选修的人很多，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他又乐于和青年学生接触、谈话，我和郑老师就是这样逐渐熟悉起来的。他曾经借给我一部《明元清系通纪》作课外读物。我那时花了很多时间，读了半部《明史》，也是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进行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阅读大部头的历史著作。阅读中碰到一些问题，有一些心得，我多次去向郑老师请教，每次他总是放下公务，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史说古，议论风生。从几次谈话中，我开始领会到了做学问的方法和道理。

我和郑天挺教授的接触就是从求学问业开始的，建立了颇为融洽的师生之谊，我们的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历史的。但后来，学生民主运动勃兴，我越来越多地从事进步活动，和郑天挺老师发生几次政治性的交往。几次交往中，郑先生都是以北大校方负责人的身份和我谈话，因为他和我已经相当熟悉，所以谈话很随便，不拘束，从中可以了解他当时的思想和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较早一次是在1947年，我们学生开始筹办子弟图书室，这是北大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当时，青年同学如饥如渴地希望阅读进步的书籍、报刊，北大图书馆虽然号称藏书丰富，却没有进步书刊，连一份《文汇报》都找不出来。为此，同学们在墙报上对北大图书馆多次提出要求和质问，后来，我们索性自己创办一个图书室，向

各处募捐书籍，给同学们提供精神食粮。我们本想争取得到学校当局的支持，图书室以蔡元培先生的号（子民）命名，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想通过正式的交涉和申请从学校获得一些经费，并解决房屋、家具的困难。为此，我和另一位同学被推举去找校长胡适，带着学生院系联合会的信函走进校长办公室，胡适询明了来意，眉头紧皱，很不高兴，他说话的大意是：学校已有设备良好的图书馆，学生没有必要自办图书室；学生的本分是努力读书，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活动上。他不但不同意拨给经费，借给房屋、家具，而且要我们把已经募捐到的图书交给学校图书馆代管代借。我们反复申述自办图书室的理由，他坚决不同意。我们碰了一鼻子灰，交涉未得结果。图书室在筹备期间占用一间小教室，总务科天天催我们搬走。后来由我单独去找郑天挺老师商谈，郑老师已经知道我们和胡适交涉的情况，当然不好公开违反校长的决定，但他耐心、同情地听取学生的要求，详细询问我创办图书室的困难，并且说我们已占用的那间教室可以暂时不退出。他的态度和蔼、恳切，和胡适的严厉训斥恰成鲜明对比，他还答应以后再考虑同学的要求。后来子民图书室虽然没有得到学校一分钱的资助，可是总务科不再催我们搬家了，并且还送来一些书架和桌椅，这正是我们急需的家具，还在教室内多接了几盏电灯，作阅览照明之用。我们没有询问谁给送来的家具，但心照不宣，知道是郑天挺老师在默默地支持学生们的事业。

郑天挺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实际负责人，不好公开发表支持学生运动的言论，也没有参加过学生中的政治性集会，谈话中也不涉及现实政治，但他对学生运动是同情的，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弟，尽力保护学生不受反动派迫害，尽可能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暗中帮助学生运动。北大学生中有很多社团，不少社团都占有一间房子（或地下室）作为活动场所。还有，北大的学生宿舍里，居住着不少没有北大学籍的青年，他们大多生活贫苦、思想进步、在北平无亲友依靠，通过种种关系住进北大学生宿舍，有的还旁听北大的课程。有一次，国民党的党部要求北大校方清理房产和“闲杂人等”，也就

是收回学生社团使用的房屋，驱逐宿舍内的非北大学生。这是很毒辣的一招，实际上是釜底抽薪，要取缔学生集会和活动的场所，驱赶进步青年，打击革命力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很着急，就分头活动，希望阻止这一活动。我到郑天挺老师处探问校方的意图，郑先生很坦率地告诉我：学校受到外界的压力，这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但决不会和同学们为难，请同学们谅解；此事是学校的内部事务，由校方调查、处理，决不让校外任何机关干预；凡是同学们正当活动的用房，包括学习、社交、歌咏、座谈、办福利的用房，只要登记一下，仍可使用，不必收回。并且告诉我：在某天，学校要派人检查和登记房屋，希望同学们把违禁物品转移，以免引起麻烦，并且在检查、登记房屋时，如来人有粗鲁行为，可以向学校报告，千万别和来人发生冲突。探知这一消息后，我们就放下心来，后来学校果然派人到一些房子去看了一下，不过是应付了事，没有发生什么事端，也没有收回一间房子。这件事，我不知道北大校方受到了什么压力，怎样进行交涉的，但即将来临的一场风波，由大变小，消弭于无形，郑天挺老师和其他教授想必花费了不少心力和口舌的。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全国学生运动的声势日益浩大，北大更多的师生员工投身于进步运动，校园内贴满了揭露国民党黑暗腐败的大字报，学生自治会和各种群众组织都掌握在进步学生的手里。国民党做垂死挣扎，准备武装镇压，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磨刀霍霍，对准了青年学生。这年4月间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的特务夤夜闯进北大校园撕墙报、砸家具，又炮制“反共”游行，雇人在学校周围乱吵乱嚷，冲进教授宿舍，捣乱破坏。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取缔华北学联，指名逮捕进步学生，声称如不交出这些学生，将武装冲进北大，进行搜捕。同学们紧急动员，连日集会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为自卫计，我们在宿舍和教室内用桌椅堆置障碍，警戒巡逻，并联络全校教职员和校外力量，进行坚决斗争。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形势十分严峻。我作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一名理事，和学校当局以及许多教授联系交谈，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团结全校师生，也要争取学校

当局能和学生们站在一起。刚好校长胡适不在北京，郑天挺教授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我和他多次恳谈接触，他怀着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同北平警备司令部周旋，为保护学生的安全，竭尽全力。那几天内，他奔走交涉，忧虑焦急之情，溢于眉宇。郑先生的态度十分明确，决不交出一个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为了声援学生，郑先生和上百名教授举行全体教授会议，发表宣言，决定罢课几天，以示抗议。郑先生作为北大的负责人不仅参加会议，而且是会议的召集人，向大家介绍了和军警当局谈判交涉的情形。他的信念是：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保卫学术自由的传统，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他亲口对我说：坚决不能让军警入校抓人，如果努力失败，将和其他教授一起，辞职抗议。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明确坚决，铿锵有声。

由于北平各院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又由于社会各界的有力声援，国民党政府怵于事态扩大的后果，只得暂时退让，没有武装入校，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我们扩大了团结面，争取学校当局和学生站在一边，这和郑天挺老师的态度是很有关系的。在那紧张的几天内，郑老师代表北京大学，向各方呼吁交涉，他把和军警当局谈判的情况、结果及时地告诉我们，和我们商量对策，协同掩护被指名缉捕的学生，为学生的安全费尽了心力。

自然，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它只是暂时缩回了魔爪，而在窥伺时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1948年暑假期间，便发生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大批学生被列上黑名单，以“共匪嫌疑”，刊登在全国报刊上，指名通缉，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当时，我放假回到了南方，对北平和学校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从报纸上看到了被通缉的消息。不久，我的父亲接到了郑天挺教授的一封信，告知我被通缉的消息，叮嘱我善自躲藏，不要住在家里，以免被捕。信中还说今后的生活和前途，等待事态平息，他可以设法介绍职业。以后，我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经过一些迂回曲折而前往解放区。但郑先生的来信是我在被通缉以后从北平得到的第一个信息。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回来已在1949年5月间，去看望了留在北大的老同学和师长，当然也去拜访了郑天挺老师。那是一个下午，仍然在子民堂西厢房他的办公室内，这天他公务不多，所以谈话的时间很长，他心情很欢畅，有点兴奋、激动，很健谈，在他面前我似乎不是一名青年学生，而是一个可以倾吐心曲的老朋友。他告诉我，看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时万众欢腾的动人场面，看到了进城的解放军和干部公而忘私、纪律严明的好作风，体会到长期受屈辱的中华民族正以雄伟的姿态站立起来。他反复赞叹：“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军队。”他详细询问我解放区的情形，渴望了解党的政策、革命的道理。他还说：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动员他离开北平，到南京去。他激动地说：“我留下来是对的，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胡先生（指胡适）他们是错了，他们也应当留下来，也应当留下来。”当然，像郑天挺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教授一定是国民党在南逃时要敦促撤离的重点对象，但是郑先生和其他许多教授一样留下来了，这标志着他和旧势力的决裂，标志着他新的生活的开始。他所以留下来，和他一贯的思想信念有关，和他对进步学生运动的态度有关。一个正直的、爱国的老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不在北大了，学习、工作又很忙，没有像从前那样向郑先生请教的机会，后来郑先生调往天津南开大学，见面很少，只在偶然的会议上叙谈几句，也不很了解他的工作和思想。但每当我想起解放前夕风雨如晦的岁月，我总会想起郑天挺老师为保护学生而做的努力。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必定会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不断地前进。“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一个正直的、博学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将会看到自己爱国爱民的理想得到实现，而日益信赖和靠拢共产党，走上光明、宽阔的道路。后来，当听到郑天挺老师以80岁高龄加入共产党的消息，我并不感到奇怪，感到这是郑天挺老师最后的、必然的归宿，我对郑老师的不断进步、勤奋工作、追求真理、老而弥笃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精神深怀崇敬之心。

纪念郑先生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不少，很多是谈他的学术成就和道德品质的，这方面已用不着我赘言。我所亲历和了解的一些情节，表现了郑老师在革命和反革命搏斗时的政治态度和优秀品德，知者并不很多，我有义务写出来让大家更加了解他。

## 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与胡华同志诀别已经十个年头。回忆当年和他相处的岁月，随从他学习，共同工作，一起读书、议论、写文章，一起谈天、逛街、游览，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我和胡华同志于1948年在正定华北大学相识。那时我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进入解放区，在华北大学一部学习。该校是一座革命的熔炉，锻炼、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以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胜利。学校分成四部两院，一部是政治训练班，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培训；二部是教育学院，有较正规的本科，分设系科；三部是文艺学院；四部是研究部。两院是工学院和农学院。胡华同志是华北大学一部最年轻的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共党史（当时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虽然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热爱历史专业，读过一些通史和专门史，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党如何诞生、如何成长、如何奋斗、如何历经挫折走向胜利，我所知甚少。第一次从胡华同志那里听到这些知识，了解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那时，青年知识分子成群结队投奔革命阵营，华大的学生激增，几天之内就新编一个班，我被编在第十七班。上课是在一片广场上，成千人都坐着小马扎听课。华北大学的教师们都富有革命经验，学识广博，口才雄辩。胡华同志是很突出的一位，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事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当他讲到死难的烈士、牺牲的军人时，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情节，真实

---

\* 原载《胡华纪念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地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他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满座为之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新中国成立前后，胡华同志经常讲课、做报告，听过他讲课的人不下几十万人，其影响之广、作用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胡华同志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教师、宣传家，我听了他的课，深深为这位年轻的革命教师所折服，那时他只有二十七岁。

十分有幸，我在华大一部结业后，被留在一部的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工作，组长就是胡华同志，从此和他共处三年多时间。组员有冯拾、李季、彦奇和我，进城后又有彭明、潘喆、何东、王淇、戴鹿鸣等同志。

1948年底，我们向胡华同志报到，他坐在昏暗的小房中，这是他的书房、卧室、会客室，披着一件破旧的羊皮大衣。当时，大家穿着灰棉制服，他的那件皮大衣可算一件奢侈品了。小房里杂乱地堆放着许多书籍、刊物、报纸。他正伏案写作，抬头打量了我们一眼，放下笔，招呼我们在炕沿坐下，向我们微笑，和我们交谈。谈论内容我已记不起来，而他亲切的微笑、柔和的声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胡华同志是待人宽厚、爱护后进的好导师。他督促我们学习，要我们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书。他那里有一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当时是难得的珍本书，我借来第一次通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进城以后，胡华同志忙碌起来了，在校外讲课、做报告，出版书籍，为报刊写文章，主持行政工作（他是华北大学第八区队的区队长）。我们做他的助手，也跟着忙碌起来。他讲课经常在大礼堂内，听众成百上千。党史中很多人名、事件、词汇，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人不熟悉，需要有人写在黑板上，我和彦奇同志担任这项板书工作。因此，胡华同志每次讲课做报告，总有我们两个人跟随着，人们戏称为“哼哈二将”。

胡华同志写文章，我们帮他找资料，记得当年他撰写中苏关系的文章，我们抄录了许多资料，和他一起商讨整理和分类的方法。有时也给他起草几段文字，他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



稿)》中最初未写东北抗日联军一段,即将付印时发现此一重大遗漏,要立即补上。他要我连夜起草,口授了提纲、要点,又给我找来一些重要材料,草稿写成后,和我一起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他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

胡华同志对我们的思想、学习、生活都很关心,用他的微薄稿费给我们购买生活用品,如毛巾、肥皂之类,有时请我们打牙祭,在小摊上吃馄饨。他平等待人,从来不摆师长和领导的架子,总是那样和蔼、亲切,询问大家的要求,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对人宽容,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即使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或者顶撞他几句,他也不会疾言厉色,总是淡淡一笑,慢慢地解释。他在第八区队工作,为了进行研究,把彭明、彦奇和我带到区队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读书、找资料、研究、写作。那时,我们之间朝夕相见,有时讨论,有时吟诗,有时散步,四个人亲密无间,相处极为融洽。

那时,胡华同志精力旺盛,忘我地工作,往往彻夜不寐。他撰写并编辑了许多著作、文章、材料,还组织和指导别人写作。当时,他要我挑选一个研究题目,试着写作。抗日战争,在我们一代人心中留下深沉的伤痛,抗日胜利也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欣悦,可是国统区人民对抗战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作用并无了解,我想用通俗的演义体裁,写一本抗日战争的简史。这个课题受到胡华、彭明、彦奇的支持,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胡华同志读了我试写的章节,感到满意,鼓励我坚持写下去,并给我保证时间、提供资料、介绍出版。1951年,《中国抗战史演义》以王金穆的笔名在新潮书店出版,这是我在胡华同志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处女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掀起了学习党史、革命史的热潮,胡华同志在其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他经常在各处讲授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时事形势,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是当年最畅销、最有影响的党史教科书。为了配合全国的学习,胡乔木同志指示胡华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彦奇和我协助编辑,收集了党的许多文件和各种珍贵资料,大多是胡华同志收藏和